

目 录

一、季莫費耶夫的反駁的整个特点	2
二、赫魯曉夫是否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	5
三、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和利用这种矛盾的問題.....	13
四、追随肯尼迪、約翰逊的政策	21
(1)肯尼迪的“开明”是什么	22
(2)是約翰逊，还是戈德华特	31
(3)誣蔑反法西斯統一战綫策略	35
五、所謂“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誣蔑	43
(1)三种歪曲	46
(2)改良主义与革命的观点	50
(3)現在还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	56
六、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	62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理論杂志《共产党人》第十二期（一九六四年八月出版），刊登了季莫費耶夫写的一篇題为《真反帝和假反帝》的文章。这是他对我党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在《赤旗报》上发表的評論員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进行的反扑。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这篇文章系統地批判了現代修正主义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被暗杀的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当作和平的政治家并公开为美帝国主义塗脂抹粉的机会主义理論，同时全面地揭露了肯尼迪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并且闡明了这种“两手政策”的实际情况。因为上述机会主义論調实际上对日本以及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克服其影响已經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所以我們才发表了那篇文章。而且那篇文章根本没有公开指名譴責苏联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在完全沒有向苏联國內介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这篇文章的情况下，就說什么“这篇文章批判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針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对各兄弟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責，說它們‘試圖回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单方面地发表了反批判的文章，并且公然对我黨的《赤旗報》編輯部极尽攻击之能事，說它采取了“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場。

这首先意味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理論杂志自己招认，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最近几年来采取的对外政策和方針，恰恰是評論員文章所批判的那种理論和政篇。如果

自己觉察不到这一点，那就不至于連《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那篇文章也不向國內介紹，就如此盛气凌人地提出反駁。我們党的評論員文章，正是挖到了以赫魯曉夫为首的国际現代修正主义潮流的病根。

第二，那篇反駁文章意味着，季莫費耶夫和《共产党人》編輯部反对《赤旗报》評論員文章所提出的科学的批判，企图顽固地维护錯誤的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論調，向我們党的《赤旗报》編輯部挑起了公开論战。受到公开攻击的人有权提出公开反駁。围绕《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的討論成为苏联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之間的公开論战的一部分，其責任完全在于《共产党人》編輯部和季莫費耶夫。

一、季莫費耶夫的反駁的整个特点

首先必須指出季莫費耶夫的反駁的整个特点。

我們党的評論員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是为了正确地彻底维护八十一一个兄弟党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路綫而发表的，文章的內容如下：

第一，文章指出了成为某些馬克思主义者美化肯尼迪的理論基础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論調”，并且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此进行了詳尽的分析和系統的批判。文章从事实和理論两个方面反复闡明了下述这样一点，即把肯尼迪作为謀求“和平共处”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级的“明智派”而加以美化的言論，归根結蒂是从根本上修正了列寧关于帝国主义的論斷，是要說明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經改变，这只能是最卑鄙无耻的投降主义的理論。

第二，文章指出了錯誤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认为这是美化肯尼迪的另一个理論基础，它是同国际上的共同課題，即究竟怎样来看主要敌人的問題有联系的。文章詳尽地闡明，“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也不过是“向两翼分化的論調”的发展，只不过是回避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的理論而已。

第三，文章談到了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并且用具体的事事实和揭露：这种政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同一个目的而使用的两种手法而已，它是现阶段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应付自己所陷入的严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从本质上來說，它是帝国主义者用“和平”和“进步”的假面具打扮起来的、极端富于侵略性的反击政策。

第四，文章根据事实分析了肯尼迪的“两手政策”通过“古巴危机”和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并在美苏間“緩和紧张局势”这种政策的假象背后，形成一条加紧推行“遏制中国”和侵略亚洲的政策的路綫的經過，并且揭露了当前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

第五，文章肯定了約翰逊政府基本上是继承了肯尼迪的路綫，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的不团结現象所造成的复杂而困难的形势，并且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据《宣言》和《声明》的精神，正确地统一对美帝国主义的評价以及对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評价。指出了《怎样評价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区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嶺》这篇文章，就是这样总结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的斗争經驗，同时呼吁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綫、帮助美化美帝国主义的那种背叛性的为帝国主义辯解的論調，并且呼吁全世界人民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如果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充分之处，所搜集的事实尚有不足

或者敘述有欠妥當之處，我們當然衷心歡迎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出發給我們指出來。因為這樣一種批評是創造性的和建設性的，通過這樣的討論，將進一步豐富和发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但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是，坦率地說，季莫費耶夫的反駁文章，同上述那種創造性的和建設性的討論是背道而馳的。

第一，他的反駁文章，儘管從本質上來說，不是提出部分的反駁而是提出根本性的反駁，但仅仅是在用詞方面語氣強硬激烈，然而，它甚至連從根本上提出反駁時所必需的那種最起碼的資格都不具備。這一點表現在，他對上面扼要地歸納出來的評論員文章的最重要的五個論點，沒有努力認真地一一加以回答。仅仅以第一點對“向兩翼分化的論調”進行的批判為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彈美化肯尼迪的老調，對第二點“主要打擊德、法帝國主義的論調”，只是一筆帶過。至于對我們在第三點和第四點上就肯尼迪推行的“兩手政策”所進行的歷史性的具體分析，幾乎沒有進行具體的反駁，只是泛泛地談了談肯尼迪政策的特點。如果季莫費耶夫要提出反駁，我們就希望他提出更有內容的、更全面的反駁。

第二，他的反駁文章，甚至在他提出的那些論點方面，都沒有充分理解評論員文章的觀點和理論；它所提出的大部分的反駁，都是一些在評論員的文章里已經有了答案的東西。而且，其他部分，也都是依靠歪曲和捏造評論員文章的觀點的手法來進行批評的，這是最低級的爭論。如果要認真地進行爭論，就必須很好地理解對方的論點，圍繞對方在理論方面提出的主張的最重要的中心問題，通過可靠的論證來進行。我們希望季莫費耶夫能夠進行更有論據的、更科學的爭論。

第三，他的反駁文章，與其說是進行理論上的反批判，不如說

只是急于給別人扣政治帽子而已。他除了給評論員和《赤旗報》編輯部扣上了“中國共产党的拥护者”这个大家熟悉的帽子之外，还扣上了經常重复提到的“新托洛茨基分子的計劃”以及“对阻止世界核战争的运动采取抵制态度”、“积极的反苏主义”、“反列宁的民族主义”等等极端誣蔑性的帽子。如果季莫費耶夫多少还想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討論，那么，我們希望他在談論对方的論点时，能够选择足以正确地表达对方观点的理論特点和政治特点的措詞。苏联共产党的同志一給別人扣上一頂帽子就会产生某种影响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不管季莫費耶夫采取什么态度，我們还是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他的观点，并且抓住他的最重要的論点，对他所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論提出反批評。

二、赫魯曉夫是否同美帝国主义 进行了斗争

季莫費耶夫首先以《不要歪曲問題的实质》为題，說他与《赤旗報》評論員的主张不同，并且斷言問題的实质“不在于反对或不反对美帝国主义。”据他說，进行这种斗争，对于全世界共产党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不說也很清楚的事，当然，对苏联共产党來說，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当季莫費耶夫搬出苏联政府在面对革命的古巴的保卫、面对帝国主义在塞浦路斯的阴谋和美国军队在“东京湾”进行挑衅活动时所采取的行动，来证明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苏联堅定的原则性立場”的时候，苏联的对外政策究竟是否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坚决斗争，这决不是不說也很清楚的事。

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引用这些例子，特别是引用古巴事件和“东京湾”事件，来证明苏联的“原则性立场”这一点，不能不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一九六二年秋天的“古巴危机”，是赫鲁晓夫在历史上留下来的、采取双重无原则态度的典型事例。他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要使美帝国主义者“更现实地感到热核战争的危险”（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就把这作为直接的目的，把核导弹运进古巴，从而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接着，他忽而一变，同意无视古巴主权的“国际观察”，从而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赫鲁晓夫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性立场——核武器在本质上是防御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首先使用它——轻率地挥舞了社会主义的核武器。结果，他在肯尼迪的挑衅面前，即在肯尼迪一面根据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加紧实行核讹诈，一面企图首先用常规武器进攻、开始侵略古巴这样一种挑衅面前陷于困境，最后悲惨地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而且还因为，苏联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发生的“东京湾”事件中采取的行动，是这样一种记忆犹新的无原则态度：赫鲁晓夫口头上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但在实际上却不顾苏联是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无视日内瓦协议，把问题提到联合国，事实上给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帮了忙。季莫费耶夫所引用的赫鲁晓夫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讲话，只不过是赫鲁晓夫的这种无原则的投降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暴露出来以后，为了掩盖其投降主义而进行的软弱无力的装饰门面的演讲而已。

如果季莫费耶夫硬要强辩，把苏联政府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在古巴，在发生“东京湾”事件时所采取的行动说成是“原则性立场”的话，那么，那样的“原则”，只能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侮辱。

如果季莫費耶夫希望我們舉出實例證明，那麼我們不仅可以舉出上述兩件事實，而且還可以大量地舉出赫魯曉夫企圖迴避而實際上已經迴避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言行。例如，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九年訪美時，頌揚艾森豪威爾總統是美帝國主義裏面的“明智派”的領袖，說他“真誠希望消除‘冷戰’狀態，建立我們兩國的正常關係，促進各國間關係的改善”（一九五九年九月在莫斯科所作的訪美歸來的報告）；赫魯曉夫還不斷地宣揚“戴維營精神”，開始宣傳“美蘇合作”。由於一九六〇年五月U—2型飛機事件，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合作成為不可能以後，赫魯曉夫這次又把希望寄託在新總統肯尼迪身上。他頌揚肯尼迪是“清醒地考慮了現實情況”的“明智派”的代表（《評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的演說》），一直奔向“美蘇合作”的道路。在“和平的政治家”肯尼迪死後，赫魯曉夫一面更加頌揚死去的肯尼迪，一面開始列舉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腊斯克和參議院議員富布賴特等人的名字，說他們是繼承肯尼迪的“和平共處”路線的、有“清醒的見解”和“現實感”的政治家（在匈牙利包爾紹德化學聯合企業發表的演說）。赫魯曉夫的這些言行，不是美化美帝國主義和代表美帝國主義的總統、在人民中間散布對美帝國主義和美國政府的荒謬的幻想，又是什么呢？

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完全違反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關於禁止核試驗和核武器的要求，屈服於肯尼迪和麥克米倫的主張，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他自吹自擂地頌揚這個條約，說它會“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普遍緩和”，“為解決时机業已成熟的國際問題創造有利的形勢”，“為解決根本的問題，即全回徹底裁軍問題開辟道路”（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答《真理報》和《消息報》記者問）。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一周年，正好是“東京灣”事件發

生的第二天，赫魯曉夫極力強調“保障”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產生的“信任的积蓄”，並且“千方百計地巩固和扩大它”。（莫斯科條約簽訂一周年答《真理報》和《消息報》記者）两天后，頌揚美帝国主義的這番話言猶在耳，美帝国主義就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了穷凶極惡的轰炸。赫魯曉夫的這些言行，難道不正是掩蓋和美化美帝國主義推行核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凶惡的真面目，隱瞞那個主要目的在於使美帝國主義永遠保持核壟斷並且阻止蘇聯以外的社會主義國家加強防禦力量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本質嗎？

赫魯曉夫把今天的世界比喻為“好象是生活在一個充滿熱核武器的火藥庫上”（《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宣揚他推行的以“和平共處”為名而同美帝國主義實行無原則合作的政策，說這是人類謀求生存的唯一辦法。而且，他一直攻擊說，那些不贊成他這種以“核戰爭毀滅人類的論調”為依據的“美蘇合作”的人，統統是“通過戰爭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這種所謂理論的擁護者”，並且要“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廢墟上、在荒無人迹的和被熱核塵埃染污的土地上建立共產主義文明”。（《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但是，他的“和平共處”論，難道不正是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核威脅，只把防止美蘇戰爭看成是超過一切的“頭等重要任務”，並且使一切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都服從於他的“美蘇合作”政策，把世界革命的命運寄託在美蘇之間的經濟競賽的結果上，最後削弱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鬥爭，從而危及和平嗎？

事實勝於雄辯。赫魯曉夫的外交政策有着數不勝數的事例，可以證明赫魯曉夫迴避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不論季莫費耶夫怎樣辯護，也是徒勞。

我們黨已經發表的題為《論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路線的本

质》的評論員文章(見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赤旗報》)，分析了赫魯曉夫的这种“和平共处”路綫的本质和实际情况。关于这篇文章，我們希望季莫費耶夫研究一下，究竟赫魯曉夫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还是沒有进行斗争？季莫費耶夫作为問題提出来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是誰？不論在口头上或者在实际上，都沒有进行斗争的又是誰？包括赫魯曉夫下台这一事实在內的历史，已經就這個問題作了严厉的裁判。

季莫費耶夫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如下的規定：

“大家知道，苏联奉行积极、灵活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謀求緩和国际紧张局势，促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遭到孤立”。(黑体是引者用的)

但是，在“使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遭到孤立”这样一个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詞句的掩盖下，把美帝国主义分成“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和并非如此的集团的两类，把肯尼迪和約翰逊等人看成是后者的代表，替他們开脫罪責，这种美化肯尼迪的做法，正是《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所要批判的对象。

季莫費耶夫又把今天的反帝斗争的內容作了如下的規定：

“今天，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这首先意味着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威力和国防威力，成功地建設新社会；这就意味着加强我們时代的所有革命、反帝力量的團結。”(黑体是引者用的)

他首先在这里譏諷我們似乎只是“在口头上”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把这同“在实际上进行斗争的做法”对立起来。当然，不是在口头上面是在实际上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是一个最重要的問題，这是不消說的。然而，在这个实际斗争中也必须包括“在口头

上”正确地进行斗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經常地最大限度地利用語言和文字，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实质以及它的一切阴谋诡计，以提高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武装他們的思想。《莫斯科声明》說：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撥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針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加强同一切不願意有新战争的国家合作。”（《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八頁）

季莫費耶夫等人故作姿态地强调不要在口头上而要在实际上进行斗争。这种說法才是在实际上反对《声明》的这一革命观点，它贬低“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撥者的阴谋诡计”（《莫斯科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語言”和一切宣传鼓动的意义，企图使他們在这方面表現的苟且偷安的立場合法化。

作为这一点的证据，只要看一下他想怎样“在实际上”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更加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他的主张，就是不去揭露帝国主义，而首先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威力和国防威力”而埋头工作。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最重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們已經領教过了在赫魯曉夫的指揮下演奏的縮小世界革命力量的三部曲：第一，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三种主要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革命运动、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缩小为只剩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二，把这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事实上缩小为苏联一个国家；第三，把这个苏联所要起的作用事

实际上缩小为只剩下“共产主义建設的胜利”。請看，他們就是这样违反《宣言》和《声明》，把联合世界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一任务缩小成为这样一个任务：爭取苏联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設的胜利”以及为此而集結一切贊同苏联路綫的力量。事实上是把国际規模的反帝斗争歪曲成为“美苏合作”下的两个体系的經濟竞赛。而且，对于批判和反对他們的錯誤路綫的人，正如季莫費耶夫所作的那样，照例加以譴責，說“他們显然在追求狹隘民族主义的目的”，“把苏联的成就同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革命、反帝斗争的利益对立起来”，“反映他們对社会主义的力量最終战胜資本主义喪失信心”，等等。而他們的这种主张，也正是我們党的評論員文章作为严重問題而批判过的那个无原則的“和平共处”論。

的确，季莫費耶夫在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內容时，也談到了“一切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的團結”。但是，既然不揭露帝国主义而拚命宣揚“美苏合作”的政策，又怎么能够“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呢？季莫費耶夫的这些詞句，道道地地是只限于“在口头上”，而他“在实际上”是拥护赫魯曉夫的亲帝国主义路綫，即在苏联一国“建設共产主义”，为了保证这一点而建立“美苏合作”体制，并为此而集結“反帝力量”。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如果談到和平共处，那么，我們党是一貫支持《宣言》和《声明》中所規定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的。我們党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綱領自不用說，就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央委员会报告、《我們党的当前要求》中，也明确地写着“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的任务”。同时，我們党一貫坚持了不妥协的斗争，反对一切試圖歪曲原来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它改变为不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

斗争，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那种无原则的妥协政策。我们党忠实地遵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规定，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为维护和平而进行了斗争。正是我们党为维护原来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而进行了斗争。而正是投降美帝国主义的、无原则地追求“美苏合作”的赫鲁晓夫，背叛了原来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

只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实际地考察一下这几年来的国际形势的现实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争论的事实，就会明白季莫费耶夫等人所说的分歧的实质“不”在于“反对或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之类的主张，显然是一种骗人的鬼话。不管季莫费耶夫等人打算怎样支吾其词，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评价美帝国主义以及怎样同它进行斗争。这是很明白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

季莫费耶夫却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一点，并且提出了下述的论点：

“实际上，今天中共领导人及其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分水岭，与其说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对当前世界发展的根本问题抱有不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当代所有革命力量的相互作用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北京的领导人及其在《赤旗报》编辑部里的支持者都离开了协商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对于把我们党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这种谴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里，已经充分地予以驳斥。这显然是诬蔑性的攻击。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而且联系到象季莫费

耶夫所指出的那些問題是与离开“协商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有关的問題，对于这一点本身，我們也沒有不同的意見。不同之点只是在于，离开了“协商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究竟是我們呢，还是赫魯曉夫和季莫費耶夫？

而据季莫費耶夫說，問題的实质似乎在于这种脱离反映在对美帝国主义的作用的評价和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法上。这就是說，并不是“反对或不反对”的問題，而是“反对的方法的問題”。

季莫費耶夫說：“他們关于美帝国主义、关于美帝国主义在現世界的作用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方法的不正确的見解，只不过是他們用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恶劣概念来偷換列寧主义路綫的整个錯誤立場的表現之一”。（黑体是引者用的）

他感到我們提出的批判的严重性，就一面把問題的实质尽量縮小到只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作用”的評价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方法”的意見分歧，一面企图靠“新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誣蔑来摆脱困境。这种嘗試是否成功了呢？且讓我們在下面对他所“独創的”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一一作出回答并加以反駁。

三、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 和利用这种矛盾的問題

季莫費耶夫为了維护那个受到評論員文章的确切批判的机会主义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論調”，在題为《关于对美国統治阵营内部各集团的評价》这一节的前半部，以总論的方式提出了反駁。

但是，他的反駁，總歸一句話，就是說，儘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性論點是要重視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各種集團之間的矛盾，但是，《赤旗報》評論員否認這種矛盾的存在，犯了拒絕利用矛盾的錯誤。這是偷換對方論點、歪曲對方主張來進行攻擊的敵法。在爭論中，這種反駁的做法也是最拙劣的非建設性的做法。

季莫費耶夫引用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所說的一句名言，即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各代表之間的意見分歧“從實際行動的觀點來看，……是極端重要的”，說什麼“這些話能夠揭示出《赤旗報》發表的錯誤的論斷的根源”。

他說：“例如，《赤旗報》文章的匿名作者斷言，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有區別地對待美帝國主義的各個集團和代表的做法歸根結蒂……意味着宣布帝國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

在這裡，季莫費耶夫如果不能夠理解評論員文章的主張，那就是有意識地歪曲評論員文章的主張。

因為，評論員文章首先指出，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和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在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也產生了種種糾紛和矛盾，造成了嚴重而且複雜的意見分歧”，並且確認“看不到這種矛盾和利害衝突，把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者完全塗上同一種顏色，將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此，“利用他們內部的裂痕，對於和平民主力量，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頁）評論員的文章，就是根據這個論點開始進行分析的。

實際上，問題正是從這裡開始。

評論員文章的批判，並不是象季莫費耶夫所描寫的那樣，針對是否承認帝國主義者的內部矛盾和對立的存在、是否應當利用這種矛盾、是否應當對各種集團採取有區別的態度等等問題的。而

这才是不說也很清楚的。評論員文章的批判，不是針對那些問題，而是針對那种对帝国主义者內部实际上已經产生的矛盾和对立的性质所作的修正主义評价和根据这种評价而制訂的修正主义路綫。但是，季莫費耶夫却躲藏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論点的背后，企图把美化帝国主义者的两手政策和追随这种两手政策的修正主义路綫硬塞进来。

他說：“現在帝国主义資产阶级阵营的状况和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如何；帝国主义資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集团用什么方法奉行它們的政策；它在要花招方面不得不走和可能走多远；无产阶级及其阶级組織在什么条件下——在露骨的法西斯警察专政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資产阶级寡头民主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对这些情况，劳动人民及其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是不能漠然視之的。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都非常重要。”（黑体是引者用的）

季莫費耶夫在这一段文字中有这样一些意图：第一，为了躲閃关于美化肯尼迪的批判，把問題說成是共产党人对付帝国主义者的統治“方法”和“花招”的策略問題；第二，給人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他們的“策略”好像同共产党人把法西斯主义分子和資产阶级民主派区別开来所采取的众所周知的策略有关系；第三，以同“資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統一战綫”的策略为名，偷偷地使赫魯曉夫等人对肯尼迪采取的无原則的妥协政策正当化。尽管改变一种說法，把“明智派”說成是“資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把問題轉移到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的“花招”而采取的“策略”方面去，情况也不会有絲毫改变。

的确，对于帝国主义者的統治方法和他們的内部对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漠然視之。关于这一点，評論員文章已經說得很清

楚。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者的内部对立能够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重要作用的时候，曾经积极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和分裂。而且，在通过人民斗争的压力，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让步的时候，曾经正确地说明他们作出的让步的本质和限度，反对对敌人抱幻想，但从来也没有拒绝积极地利用这种让步，把它作为发展人民斗争的“阵地”（列宁语）。今后如果还有这种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仍然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如果这种“让步”是伪装的让步，是欺骗人民以便保持帝国主义统治的，那就决不容许看错它的本质，而使那种对让步实行无原则妥协的行为正当化。何况，把在今天的条件下以“两手政策”的形式推行了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肯尼迪看成是争取“和平共处”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成是“明智派”，并且以所谓要利用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有区别地对待帝国主义者的各个集团等等借口，使那个同肯尼迪实行无原则妥协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当化，那就会陷入最有害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评论员文章所批判的，并不是一般地利用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的做法。它批判的是那种由于无原则地扩大关于利用帝国主义者内部矛盾的论点而同美帝国主义实行机会主义性质的妥协的做法；它批判的是那种构成使这种无原则的妥协正当化的前提的观点，也就是那种把最近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内部对立看成是“冷战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本对立”、认敌为友的修正主义观点。

“但是，如果过高估计敌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以至于把这种意见分歧和对立看成是冷战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本对立，那么就会铸成这样一个大得无可比拟的错误：把‘敌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敌我之间的不可超越的对立等量齐观，把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根本性质的阶级矛盾等量齐观。”（《肯尼迪和美帝国主

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七頁）

季莫費耶夫等人为了维护赫魯曉夫的外交政策，就不得不頑固地反对这一点。因而，他才硬要說什么如果利用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的做法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把它們的矛盾看成是好战派和“和平共处派”的对立的看法的正确性，也是不言自明的。

他說：“《赤旗报》的編輯們认为，把西方国家統治集團分成‘好战派和和平共处派——根据它們是否想进行核戰爭’，是不正确的。……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里白紙黑字地写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清醒地估計力量对比和现代戰爭慘重后果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也表示贊成和平共处政策’。大家知道，有八十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声明》上签了字。也許，現在《赤旗报》把这些代表也都描繪成‘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和‘反革命分子’？”（黑体是季莫費耶夫用的）

季莫費耶夫为了进行反駁而引用了《莫斯科声明》，这反而非常清楚地证明他认定最近帝国主义者之間的内部对立的本质就是“冷戰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对立”。《莫斯科声明》只是指出了在任何一个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可以看到的在一部分資產階級中也出現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者的这一事实，而决不是說帝国主义的代表、更不是說象肯尼迪和約翰逊那样的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已經从根本上改而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然而，季莫費耶夫却把“一部分資產階級”偷換为“一部分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偷換为“帝国主义的代表”，这是因为季莫費耶夫总想設法替赫魯曉夫报行的同美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則妥协的政策进行辩护。

以赫魯曉夫和季莫費耶夫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义者，硬說帝

國主义者已經分化成為“好戰派”和“和平共處派”，這是因為他們根據“實際行動的觀點”，聲言要孤立他們認為是唯一敵人的“好戰派”，因而把肯尼迪等人的“和平共處派”看作朋友，想大膽地同他們實行妥協。但是，列寧曾經嚴肅地告誡人們說，決不能用這種辦法來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在緊接着季莫費耶夫所引用的列寧那一段話的後面，列寧是這樣說的：

“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作個覺悟的、信仰堅定的、思想上的宣傳家，而且想在革命中作一個群眾的實際領導者，那他的全部事情、全部任務就在於估計這些分歧，確定這些‘朋友’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也就是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何時完全成熟。”（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三一卷，第七六頁；黑體是列寧用的）

我們正是為了“確定……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何時完全成熟”，才必須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但是，季莫費耶夫等人同列寧的指示相反，實際上是要以削弱一方面的敵人為借口，而同另一方面的敵人——這不是一部分，而是敵人的主流和代表——無原則地勾結。這樣的策略，非但不能削弱一方面的敵人，反而必然會加強所有的敵人的力量，這是不言而喻的。把美帝國主義者的代表錯誤地看成是同樣爭取“和平共處”的朋友的這種根本性的錯誤，終於使他們陷入加強整個美帝國主義的根本性的妥協和投降的泥潭，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把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觀點同削弱所有敵人的觀點正確地統一起來，並且給予正確的評價，才能把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策略同削弱和打倒所有敵人的革命前景正確地聯繫起來，並根據這個前景正確地運用這個策略。而且，“一個共產黨人……想在革命中作一個群眾的實際領導者，那他的全部事情、全部任務”就在

于此。所以，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第一，要把发展整个的人民革命斗争，依靠人民的斗争力量作为根本方针；第二，包括同一部分敌人订立临时的协议的情况在内，要严格地注意不要对所有的敌人抱任何幻想；第三，在这些基础上，对于敌人因内部矛盾而表现出来的不同政策和态度，要正确地识别其本质，并且正确地加以对待。

季莫费耶夫在敌人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企图使他对一部分敌人——实际上是对肯尼迪那样的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所抱的幻想合理化。但是，这非但不会欺骗敌人，反而会欺骗自己人，象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尖锐地暴露出他已经抛弃了要通过发展人民革命斗争的办法来削弱所有敌人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革命的、原则性的观点。

季莫费耶夫不去科学地研究列宁的文章，不是把它当作理论，而只是把它当作仅供引用的文集，从中断章取义地引用有利于自己的文字。季莫费耶夫的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可笑的例子。那就是，他企图引用下面一段列宁的话来证明他自己的主张。

他说：“弗·伊·列宁不止一次地说，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到过去和现在存在于帝国主义政府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当中的各集团、派别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强调指出，要有区别地对待‘资产阶级和政府中的开明人士’——这是一方面——和‘冒险分子’——这是另一方面。”

后半部分引用的话引自列宁《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给政治局的信》（一九二一年）（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三三卷，第一一五页）。可是，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开明人士”和“冒险分子”，是指“属于前俄罗斯帝国”或者同“边境”接壤的“波兰、芬兰和罗马尼

亚”三国而言的。

在曾经受帝俄、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而在俄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终于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里，而且当时在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已经由事实证明的情况下，在这些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在同近邻的革命俄国的关系方面，也产生了和平情绪和“开明”，是很自然的事情。把列宁的这句话说成是好象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从而企图用援引列宁的话的手法，使他所谓在今天的美帝国主义政府里面有“开明人士”的这一发现具有权威，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说是对读者的一种欺骗行为。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已经充分地阐明，把美帝国主义者内部现在发生的对立看成是“分化为好战派与和平共处派”的这种观点，就是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能够产生非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的观点，也是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论调，归根到底，是一种宣传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从而瓦解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的反帝斗争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对于这个分析，今天也不需要从根本上作任何补充。评论员文章决不否认帝国主义者的意见发生分歧这一事实，反而从积极地承认并正确地利用这个分歧的事实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分歧的性质和对它作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的问题。与此相反，季莫费耶夫却只是罗列分歧的事实，以为这样就是进行了反驳。遗憾的是，这几乎完全不配称为反驳。

他说：“《赤旗报》的编辑们步北京作者的后尘，在对现代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评价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并作了错误估计。他们硬说，似乎在一种社会经济基础上——这里就是指在大垄断资本的基础上——只能奉行一种政策，即最富于侵略性的最反动的政

策。弗·伊·列寧已經在半个世紀之前就把这种观点称为‘对馬克思主義的嘲諷’。”

評論員文章根本沒有說過，在壟斷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上，只能推行一种象戈德华特那样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反动的政策。評論員文章說：在壟斷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上，能够推行以戈德华特和肯尼迪等人为代表的各种政策；然而这决不会是真正希望和平的**非帝国主义政策**，而始終只能是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政策**；必須統一地充分理解这些政策。正因为这样，評論員文章才提出了区别于极右派的政策的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全面地分析了它的本质和動向，尖銳地批判了季莫費耶夫等人所維护的修正主义理論。这种修正主义理論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間的意見发生分歧的这一事实，模糊本质，說帝国主义者“分成好战派和和平共处派”，頌揚肯尼迪的“两手政策”。

季莫費耶夫只提出評論員文章中強調各种帝国主义政策在本质上的共同性的部分，誣蔑說評論員文章忽視了它們的差別，同时反过来又片面地夸大它們的差別，企图否定在本质上的共同性。被部分的差別和現象遮住眼睛，看不見事物和情况的本质，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性論点，这正是老的和現代的、东方和西方的修正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共同特点。季莫費耶夫和評論員，究竟是哪一方面“嘲諷”了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嗎？

四、追随肯尼迪、約翰逊的政策

如上所述，季莫費耶夫对我们党在評論員的文章中批判“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論調”的論点所提出的反駁，实际上不过是企

图美化帝国主义者及其欺骗性的政策。他的論点上的錯誤，通过他在那一节后半部分对肯尼迪和約翰逊的論述，显然就更加明确和更加具体了。

(1) 肯尼迪的“开明”是什么

季莫費耶夫是怎样看肯尼迪的呢？尽管会使文章冗长一些，但为了准确起見，还是需要全文引用能說明他的特点的一段。他写道：

“約翰·弗·肯尼迪表达了在新的条件下，即在美國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急剧削弱的条件下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他不得不考虑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世界社会主义已經进入了同资本主义經濟竞赛的决定性阶段。也不应当忘記，在美国國內，工人阶级、农民，往往还有城市的中等阶层，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部分受垄断一切的大垄断組織排挤的非垄断資本資产阶级在同美国垄断資本对抗。美国統治集團不能不考慮两千万黑人的日益蓬勃发展的斗争，他們要求平等，要求彻底铲除可耻的种族歧視的制度。

“所有这一切过去和現在能在迫使美国政府领导人玩弄手腕。他們現在不得不在远比以前复杂的社会經濟的和政治的局面中保护美國垄断組織的陣地。肯尼迪把諸如提高美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某种程度上扩大黑人的公民权的問題等等提出来作为美国統治集團的首要問題，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这些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措施，目的是提高美國的搖搖欲墜的國際威望。

“能不能說約翰·弗·肯尼迪在任总统时期始終不渝地奉行了符合美国资产阶级的稳进、冷静和开明的代表人物的要求的方針呢？不，当然不是。只要提一下下面的情况就足以說明了：美國

雇佣兵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进行了扩军竞赛、他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措施显然都充满了‘冷战’精神以及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一直在迫害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

“但是，把肯尼迪总统奉行的政策同美国垄断资本最富冒险性和侵略性的极端反动的集团的立场等量齐观也是不对的。”（黑体是引者用的）

季莫费耶夫为了避免被指责为美化肯尼迪而在用词方面相当谨慎，但是他的出发点是，首先把肯尼迪的政策分为两个部分，即“稳健、冷静、开明的”部分和反动的、侵略的部分。而且，季莫费耶夫在对外政策方面搬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外交，在国内政策方面搬出了“经济发展”政策和对黑人的政策等来作为说明“开明”政策的典型例子。他列举继续进行扩军竞赛和继续推行“冷战”政策、镇压共产党等来作为说明推行侵略和反动政策的例子。季莫费耶夫提出的这种关于肯尼迪的论断的出发点，显然是早已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所批判过的、美帝国主义“具有善恶两面的论调”。对于那种说肯尼迪政策具有善恶两面的资产阶级的庸俗的观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指出，任何一种说美帝国主义“具有善恶两面的论调”，实际上都必然会转化为从本质上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说：“这种承认肯尼迪政策中存在着真正想要争取和平的一些‘好的方面’的‘善恶两面论’，实际上一定会随即变成为这样一种看法：把冷战政策这种另一个‘坏的方面’看成是为了说服国内的冷战派而不得不采取的‘伪装’，或者把这看成是被迫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下来的‘遗产’。由于这样的解释，最后就变成了这种观点：认为整个肯尼迪政策的根本特点，就是向和平政策转变。……这件事表明，任何有条件地美化帝

國主義的論調，都容易變成、而且也不能不變成美化它的本性的論調”。（《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三頁）

季莫費耶夫關於肯尼迪的論斷，清楚地證明評論員所指出的上述一點是正確的。這就是說，季莫費耶夫的出發點是從肯定肯尼迪政策的善惡兩個方面出發的，結果，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肯尼迪總統的政策中即使有過不容忽視的暫時的和部分地越出常軌的政策，但也是同“美國壟斷資本最富冒險性和侵略性的極端反動的集團的立場”有明確的區別的；儘管“當然不是”“始終”“不渝”，但他還是採取了“符合美國資產階級的穩健、冷靜和開明的代表人物的要求的方針”；這也就是說，肯尼迪基本上是好的。並且，他還以此為借口，企圖使赫魯曉夫採取的追隨肯尼迪的政策披上正當化的外衣，並且企圖具體地給它奠定理論基礎。季莫費耶夫把已經受到評論員文章批判過的“善惡兩面論”搬出來為自己立論，恰恰再一次暴露了他所提出的反駁，不過是甚至連評論員文章的精神都未能理解就杜撰出來的粗糙的東西。

至此，問題最後可以歸結到這一點上了：就是在肯尼迪推行的國內外政策中，究竟是否有過包括受到和平民主力量（儘管是有條件地）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的內容在內的、“穩健”而“開明”的政策呢？在他的國內外政策中，是否有過能使美帝國主義不再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在本質上同極右派區別開來的內容呢？

眾所周知，肯尼迪政策的特點之一，就是採取“兩手政策”。這就是說，他不單採取露骨地直接進攻的辦法，而且還戴上“和平”和“進步”這種假面具。從這個意義上說，恐怕不能說肯尼迪政策裏面絲毫沒有那些考慮到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和人民鬥爭的壓力等因素。

但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來看，重要的不僅在於帝

国主义者究竟是否“考虑”到社会主义的成长和人民斗争发展的压力，而且还在于这种“考虑”和“要手腕”的本质如何以及用阶级观点对它进行评价。季莫费耶夫把帝国主义者的“考虑”全部无条件地同由于受到人民斗争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实质上的让步、帝国主义统治在实际上的后退混淆起来。但是，对于帝国主义所表示的对人民斗争的压力的“考虑”，究竟是否意味着上述那种让步和后退，还是帝国主义用一种伪装的让步和后退来骗人，抑或是完全没有让步和后退的新的进攻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这一切都要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具体的分析。在这里，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存在着使季莫费耶夫等人同评论员的看法发生尖锐对立的分歧点。这也是产生对肯尼迪政策的完全相反的阶级评价的根源之一。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对外政策。正如《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已经作出的详尽的论证那样，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肯尼迪的“两手政策”都决不是和平民主力量迫使美帝国主义作出的实质上的让步的政策。完全相反，这种政策，是在目前阶段，最现实地最有效地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阶级利益，面对着和平民主力量的压力欺骗人民，进行最现实而有效的反击的——从本质上来看——最富于侵略性的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之一。

但是，季莫费耶夫认为，肯尼迪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在于，这种政策是在急剧衰退的美帝国主义的地位的逼迫下，并且现实地考虑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增长，从而为了“保护美国垄断组织的地位”和“提高美国的摇摇欲坠的国际威望”而采取的防御性的、被动的政策。而且，季莫费耶夫还企图以此为理由来美化肯尼迪的对外政策。

实在令人惊异的是，在季莫费耶夫所杜撰的这种特点中，首先

在本质上抹煞了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最大特点即凶恶残暴的侵略性的认识。肯尼迪确实“保护”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益，但他是欺骗手法的掩饰下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来保护美国的利益的。肯尼迪的对外政策的历史自从进攻古巴揭开第一頁以来，頁頁都是血腥的战争和侵略的纪录。一九六一年四月进攻古巴；同年七月在柏林問題上采取了挑衅性的军事措施；从这一年七月底起在刚果加紧进行战争；从一九六二年初起，公然派美军到南越，对南越进行军事侵略；同年五月出兵泰国并派第七舰队到印度支那海面；同年九月，为了应付古巴和柏林的局势，而把十五万人编入预备役；同年十月制訂进攻古巴的计划并对它实行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核战争部署；从一九六三年初起加紧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加紧对南越和老挝的军事侵略等等。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在季莫費耶夫的眼里，不都是一些混杂在“开明的方針”里的次要的东西嗎？我們在这里需要指出，觉悟了的日本人民一刻也不能忘記这样的事实：肯尼迪积极地继承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的包括对冲绳的殖民军事占领政策在内的侵略政策，在我国保持很多军事基地并加紧进行核武装。

編制历史上最龐大的軍事預算，瘋狂地扩充核力量、常規兵力和特殊兵力的所有軍备，加强北大西洋軍事集团和推行多边核力量計劃，准备最后建成以日、“韓”、台相勾結为核心的东北亚軍事同盟，并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以“北极星”式导弹和“民兵式”导弹为主的大規模的核威慑体制，实施龐大的統治世界的計劃，这便是肯尼迪的对外政策，然而它却被季莫費耶夫归結为仅仅是“扩軍竞赛”和“外交上的一系列措施”。自从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来，肯尼迪就越来越把他的战争和侵略的锋芒指向了亚洲地区，一

一直在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这个事实完全被季莫費耶夫抹煞了。而且，更严重的是，象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过低估计或无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并不仅仅是季莫費耶夫一个人。

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信中，有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违反现实的、使读者吃惊到怀疑自己看错的程度的论点：来信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失掉了施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什么“帝国主义被迫同意与各国和平共处”。既然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丧失了施行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放弃了实力政策，同意和平共处，那么季莫費耶夫认为可以无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曾经一度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基本调子不是侵略性的实力政策，而是放弃了实力政策的“和平共处”政策，那么就势必不向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去寻找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而向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根源。赫鲁晓夫曾经公开提出的下述这样一种关于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的主张，就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他说：

“一方面，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冒险势力，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在同社会主义的和平竞赛中能坚持住的希望的所谓狂人，千方百计地图发动战争。另一方面，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却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条件下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教条主义者，企图把事件也推向这个方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认为国际局势紧张的真正根源，不在于美帝国主义为称霸世界而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而在于一部分极右派的狂人和

一部分极左派的教条主义者——这就是潜藏在赫鲁晓夫和季莫费耶夫等人攻击那篇认为正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政府才理所当然地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敌人的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并且拼命地替肯尼迪辩解的思想深处的令人吃惊的看法。事实上采取了由美苏合作来同这些极右派和极左派进行斗争以保卫和平的这种立场的赫鲁晓夫和季莫费耶夫等人，完全错认了敌友，对这一点，大概无须作更多的说明。

以赫鲁晓夫和季莫费耶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能够举出的美帝国主义“开明”的对外政策的唯一“实际证据”，恐怕就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肯尼迪在美苏之间所采取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再没有什么能比这项在美苏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更清楚地暴露出肯尼迪的“开明”的本质的事实了。正如评论员文章所详尽指出的那样，肯尼迪在美苏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是一个最危险的新阴谋。这一阴谋的目的是，在目前的新形势下，抑制苏联的核力量，更加迅速地推行对亚洲的侵略政策；用“缓和紧张局势”的假象来争取时间准备核战争，促使社会主义各国“自由化”、“瓦解”和“多元化”，使全世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产生幻想，以分裂反帝力量。但是，季莫费耶夫却认为肯尼迪采取的在美苏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这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社会主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新的形式——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杜勒斯和戈德华特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以及反社会主义计划的“稳健”和“开明”的政策。这一点只不过证明，肯尼迪实际上所进行的欺骗，至少在季莫费耶夫身上取得了效果。

关于肯尼迪的对内政策，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的。

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季莫费耶夫认为，肯尼迪的国内政策的

基調似乎也是“稳健的”、“开明的”“提高国际威望”的政策，这种政策同极反动的极右派的政策有区别，重視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竞赛，考虑到国内广泛阶层的反垄断資本的斗争和黑人斗争的发展。

令人惊异的是，这里也漏掉了对美帝国主义对內政策的反动本质的評价。在季莫費耶夫的朦朧眼看來，甚至把“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也同“其他一些措施”一样，似乎都只看成“肯尼迪打算用来提高美国的搖搖欲墜的国际威望的东西”。“提高国际威望”这句資产阶级用語，說明了季莫費耶夫是用資产阶级的观点来理解美帝国主义为維护其統治地位而进行的拚命掙扎这一事实的。而季莫費耶夫偏要从肯尼迪的反动經濟政策中，首先專門看他努力“提高国际威望”这一点，这种議論本身就更是資产阶级的了。这是同每天实际同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进行斗争、同它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民的立場毫无关系的一种替美帝国主义辩护的論調。

季莫費耶夫所特別重視的“开明”的“提高国际威望”的政策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黑人的公民权”。

对美帝国主义來說，这的确是“开明”的政策。肯尼迪对黑人問題究竟是怎样“开明”和“打算”的，还是讓我們看一下他自己的話吧。

“种族歧视，妨碍我国最高度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資源，从而成为我国經濟发展的障碍。因为这是在国内否定我們在海外所宣传的教义，从而削弱了我国在世界上的領導作用。它损伤使这个国家伟大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沒有阶级的社会的氣氛。它还使为社会福利、犯罪、不法行为和沒有秩序等所花銷的費用增加。这首先就是违法的。”（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关于民权的特別咨

文})(黑體是引者用的)

那么，季莫費耶夫到底是要說肯尼迪在这种打算中是对什么“开明”又是怎样“开明”的呢？据我們所看到的，肯尼迪在有关黑人的公民权問題上，首先是无条件地、赤裸裸地从正面提出美国垄断資本的阶级利益。肯尼迪很了解，在目前的阶段，仅仅用极右派主张采取的恐怖主义来回答这个問題，已經不能充分地维护美国垄断資本的阶级利益。在这里，問題并不在于一般的“开明”，而在于“开明”的阶级內容和对它进行的阶级評价。但是，季莫費耶夫却又忘記了这个最为要緊的問題。一九六三年五月的伯明翰事件以后，面临着反对种族歧视的群众斗争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規模最大的斗争这一問題，肯尼迪采取的政策是建議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和呼吁“不要把街头作为斗争的舞台”。这是在斗争的压力面前抑制美国黑人的解放斗争，不让它成为使反对美国統治阶级的、战斗的、民主的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新动力，而把它轉移到无害的議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当人民的斗争已經燃烧起来，达到了“靠警察的鎮压行动已經不能应付”（肯尼迪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关于种族歧视的演說）的地步的时候，肯尼迪所采取的对付黑人的政策，除去自古以来統治阶级为了貫彻其阶级統治而采取的“仿佛是让步”（《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十六卷，第三四九頁）和阶级利益打算以外，究竟还包括了什么內容呢？从政策的实质方面来看，这同季莫費耶夫作为性质不同的东西而同这对立起来的“对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迫害”并无不同。这些只不过是从肯尼迪的反动的国内統治政策这同一个根源产生出来的两种現象而已。

不論从对外政策來說，还是从对內政策來說，如果把肯尼迪的政策看作是在本质上区别于极右派政策的“进步派”政策而加以美

化，这将导致比把它同极右派等量齐观还要大的錯誤。因为后者是对各个时期敌人的策略的估計上的錯誤，而前者是对敌人的阶级本质的估計上的錯誤。

(2) 是約翰逊，还是戈德华特

季莫費耶夫实际上是企图采取评价肯尼迪的“开明”政策的方式，来证明赫魯曉夫所实行的无原則地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的这一企图，从他試圖证明在一九六四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約翰逊是正当的这一点来看，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以阻止戈德华特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取胜为借口，而公然支持了約翰逊。例如，在总统选举之前，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登载了克里奧諾夫写的題为《对前途感到恐惧的美国反动势力》的文章。文章关于总统选举的主要課題写道：“掌握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的是什么样的集团：是能够或多或少冷靜地估計世界事态的进程的力量，还是对历史的一往直前的发展感到野兽般的恐惧的力量”。（見塔斯社通訊稿日文版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一期）文章說，“对此各国人民决不会漠不关心的”。克里奧諾夫在这里所說“能够或多或少冷靜地估計世界事态的进程的力量”显然指的是以約翰逊为首的势力。

約翰逊当选以后，塔斯社在十一月四日发表的題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它的政治意义》的評論公开說：

“《紐約先驅論壇報》四日指出‘选举人投了約翰逊的票，这是因为他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約翰逊才是能够放心地把美国的外交委托給他的唯一的候选人。’这个說法是正确的。”

无疑，塔斯社的評論員是在无条件地拥护那篇贊揚投約翰逊

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文章的作者。

在同是十一月四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評論員評論總統选举結果时这样写道：

“林登·約翰逊已經成了今后四年內白宫的主人。假如他作为总统的努力符合他在选举演說中提出的綱領，那么就有理由期望，美国将采取現實的步骤来进一步改善世界的政治气候，发展同別国的正常而互利的关系，解决有待解决的国际問題。美國的这种方針，同为加强世界和平同准备合作的苏联的立場完全一致。”
(見塔斯社通訊稿日文版)

在支持約翰逊的言論中，几乎不可能有比这更露骨的了。

季莫費耶夫企图为現代修正主义者露骨地支持約翰逊找“理論”根据，就气势汹汹地写道：

“壟斷統治集團在这个或那个时期采取什么方法执行政策；在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和两个体系的斗争的影响下，壟斷統治集團准备作哪些让步；这种让步政策，在资产阶级各种派别中间引起哪些倾軋和矛盾，这一切对工人阶级說来，并不是无所谓。

“难道《赤旗报》編輯部果真认为，一九六四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誰获胜，对美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說来都是无所謂的嗎？尤其是，难道赤旗报編輯部居然认为：已經為极右分子占据了共和党的领导机构，并且通过这一事实表現出来的极端反动势力的进攻，絲毫不改变美国現今的政治生活，沒有向美国民主力量提出任何新問題和新任务嗎？”

“共产党人，无视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壟斷資本集团的代表人物猖獗起来这一事实，是不对头的”。

看来，季莫費耶夫等現代修正主义者，向“美国的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推荐約翰逊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似乎是因为戈德华特

是美国垄断資本的“最反动最富于侵略性集团的代表”，而約翰逊却准备采取让步政策，他同戈德华特根本不同。據說共产党人反对約翰逊是“不对头”的。

戈德华特同約翰—伯奇协会及其他法西斯勢力更紧密地結合在一起，他是最凶恶的法西斯反动政治家，这是自不待言的。而且，对于他充当共和党的總統候选人这一事实的危险性，当然不能过低估計。我們決沒有低估戈德华特及其竞选總統的意义。

但是，制止戈德华特的真正途徑，决不在于：为了防止戈德华特当选總統，而去支持約翰逊。

因为扶植戈德华特的，正是美帝国主义的資产阶级，并且也正是肯尼迪和約翰逊的反动政治本身。因为戈德华特所代表的路綫同約翰逊路綫之間的对立，决不是牵涉到美帝国主义的基本路綫的对立，更不是法西斯主义为一方同反法西斯的民主主义的另一方的根本对立。而是面对着象越南局势和古巴革命的发展引人注目地表明的那样，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計劃正在遭到破产，又象黑人問題同样引人注目地表明的那样，美國國內的各种矛盾正在加剧的局势，爭夺美帝国主义政治領導权的这两条路綫之間，在推行同一个侵路的和反动的根本政策的基础上，只不过存在下述策略上相对的不同而已，就是：当前究竟是采取戴上“和平”和“进步”的假面具来欺騙人民的“两手政策”呢，还是采取更露骨的战争和反动政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視这两条路綫的共性，同时也重視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对立；为了同时削弱这两者，认为和平民主力量應該积极地利用这种对立，并且承认在“反戈德华特”的运动中，以曲折的形式部分地反映了美国民主力量的斗争的事实。但是，这同以約翰逊与戈德华特互相对立为借口而支持約翰逊当选或美化他的路綫，是有鑿壤之别的。

实际上，正如战后美国“两党政治”的全部现实所显示的那样，民主党的和共和党的这两条相类似的路线，一直是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共同促使美帝国主义推行其对外的侵略和反动的基本政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实行骗人的“两手政策”的反动政治的情况下，极右派得到发展，戈德华特出籠了。而戈德华特的叫嚣，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约翰逊越来越反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态的实质，就是这种恶性循环，这是美帝国主义日益腐朽的集中表现。例如，最近戈德华特的核政策和亚洲政策，促使约翰逊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变得更加穷凶极恶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戈德华特和约翰逊这两条路线，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全面走向反动的同一过程中的两种表现而已，前者更加露骨，而后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对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都绝对不要抱丝毫幻想，而且必须揭露他们的实质，为反对贯穿在这两者当中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剥削和掠夺的政策而斗争，并且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现代修正主义者支持约翰逊，不是别的，正是公开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卖給美帝国主义和约翰逊政府的背叛行为。

正如季莫费耶夫的文章典型地表现的那样，现代修正主义者支持约翰逊的论调完全反映了一种叛徒的思想，这种思想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把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每天都直接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政策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立场放在眼里而产生的。比如说，难道季莫费耶夫能够规劝跟美帝国主义者残暴的侵略罪行进行浴血斗争的越南人民和刚果人民以及经常受到美帝国主义者攻击威胁的古巴人民去支持负责指挥这种侵略罪行的头子约翰逊总统吗？美帝国主义勾结日本反动势力，加强日美“安全条约”，占领冲绳和小笠原群岛，在日本全国遍设军

事基地，美国核潜艇强行进驻日本港口，变日本为进行核攻击的基地并推动日本实行核武装。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季莫費耶夫认为我們應該劝說日本人民去祈禱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約翰逊取得胜利嗎？正是因为季莫費耶夫等人根本不把上述人民的斗争放在眼里，所以才那样恬不知耻地公然发表頌揚約翰逊的国内外政策、向人民斗争泼冷水的議論。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发表当时，中心問題是：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主要是美化肯尼迪的对外政策，从而采取了追随的政策。但是，季莫費耶夫提出的反駁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的美国总统选举时支持約翰逊的行徑，清楚地表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現在已經不仅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而且还美化它的國內政策，从而堕落到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整个国内外政策的地步。

（3）輕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

季莫費耶夫企图以援引列宁、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的文章的办法，为其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政府的根本錯誤論調树立威信。为了粉碎季莫費耶夫的最后論据，对这个問題也有必要加以研討。

首先，关于列宁，他是这样說的：

“无疑，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統治集团的不同派別一向是分別对待的。例如，記得弗·伊·列宁在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国总统选举的結果和意义》（一九一二年）里指出了“資产阶级政党的危机”，同时，并不是用同一种尺度去衡量美国資产阶级的这些政党，而是分別对待这三个資产阶级候选人——威尔逊、罗斯福和塔夫脫的不同立場”。（黑体是季莫費耶夫用的）

但是，季莫費耶夫所援引的列宁的文章，并不是象他強調的那

样，告诫人們不要“用同一种尺度去衡量美国资产阶级的这些政党”。恰恰相反，列宁在这篇文章里，要求人們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这样一个同一种尺度去衡量资产阶级各个政党的阶级本质及其多种多样的表现。这就是說，列宁闡明了这样一些事实：威尔逊的民主党和塔夫脱的共和党之間的“区别愈来愈小”；罗斯福的新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进步党，是美国第一次出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而这种“改良”“显然都是无聊的騙局”。

列寧在《帝国主義論》一书中，就美帝国主义写道：“美国近几十年來經濟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也正因此而表現得特別明显。”（《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十二卷，第二九四頁）現在，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比列寧指出的那个时候还要大。現在，美帝国主义不仅是最強的帝国主义，而且也是最腐朽的、最富于寄生性的帝国主义。爭夺这个“高利貸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間的差別，已經比列寧那个时代“愈来愈小”。現在來理解这一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很明显，季莫費耶夫为了使他們对肯尼迪和約翰逊所采取的无原則的追随政策言之成理而援引列寧文章的做法，是歪曲了当时列寧的主张的荒謬做法。

不仅如此，列寧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話的后面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寄生性迅速增大，因此，在以前曾經有过一定的重要意义的“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和“君主派的资产阶级”之間的“政治上的差別”也大为縮小，而它們作为具有寄生性的一定特征的资产阶级都已成为反动势力，同时列寧严厉地批判了对“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所抱的一切幻想。列寧說：

“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來比較一下，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們之

間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別也大大縮小了，這倒不是因為這種差別根本不重要，而是因為所有這些資產階級都帶有明顯的寄生性的特徵。”（同上書，第二九四頁，黑體是引者用的）

當然，共和派的美國同君主派的日本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的“政治上的差別”，在它們的寄生性增大的同時，已經越來越縮小的這一无可置疑的事實，正象列寧補充說明的那樣，決不意味着在任何情況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差別都不重要了，也不排除那些表現在其他特徵上的政治差別會變得嚴重起來的可能性。在列寧逝世以後登上階級鬥爭舞台的法西斯主義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歷史經驗，已經最明顯地、最大規模地證明了這一點。季莫費耶夫也企圖從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驗中找出更能自圓其說的論據。他在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話的同時說，“注意資產階級各種各樣階級統治形式和變種之間的區別，注意資產階級陣營中各個集團之間的差別，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是多么重要”，並且擺出了共產國際為建立“反法西斯、反戰統一戰線”而採取的策略。

季莫費耶夫在這裡特別念念不忘的，是同羅斯福之間的“同盟”。這一點，可以從下述情況中清楚地看出來：他在上面那一段話的後面，引用了毛澤東曾經“十分重視羅斯福的現實政策”，並且指出同“美帝國主義的更加反動的集團的代表（赫爾利等人）”之間的區別這一段文字；同時，季莫費耶夫還把肯尼迪的“新邊疆”政策比做羅斯福的“新政”。

當我們把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作為問題提出來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肯定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的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法西斯主義即“金融資本的極端反動、極端沙文主義、極端帝國主義分子的公開恐怖獨裁”（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的任

务》)登上了舞台，因此，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新的历史任务就提到无产阶级的面前。

日德意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对人民实行的暴力统治为基础，推行了最凶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这一事实就把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反对法西斯、维护民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反对日德意的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的抵抗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联系起来了。这一过程，同时又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对立非常尖锐化，并且使帝国主义阵营完全分裂，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众所周知，由于苏联人民开始了抗击德国侵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成了包括苏联和美英帝国主义为打倒日德意帝国主义而实行的临时联合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宏大的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且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诚然，在这一时期，代表美英帝国主义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同苏联和各国人民实行了临时的联合和共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然而，不论季莫费耶夫怎样引用这个时期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文章，也不能够使他美化肯尼迪、同肯尼迪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并且追随肯尼迪的主张言之成理。这只能暴露出，他诬蔑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犯了双重和三重的错误。

第一，季莫费耶夫进行荒谬的机械的类推，达到滑稽的程度。

当时，所以能够把罗斯福和丘吉尔作为临时的同盟者，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在德国法西斯“正在充当国际反革命的先锋、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反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祖国苏联的十字军的创始人”(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黑体是引者用的)的时代，在打倒日德意帝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上，美英帝国主义和苏联以及反法西斯人民之间有共同点，并且为此目的签订了一定的协定。而且，这些都

是同下列情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等人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等人已經在事实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而，在今天，虽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加深，但是，还不容許机械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这种分裂和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来类推。而且，今天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莫斯科声明》）的，并不是德国法西斯，而正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非但不想在实际上同社会主义和各国民众合作，反而成了反人民、反民族、反社会主义的罪魁，成了侵略和军事干涉、反共和反革命的祸首，成了各国民众的国际共同斗争的主要敌人。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正是今天向全世界人民提出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只要不是认錯了时代，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今天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形势，即打倒日德意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为世界人民反帝统一斗争的中心任务，苏联和各国民众能够同罗斯福等人实行一定的临时的联合和合作；当时罗斯福和美帝国主义的处境，同今天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有着根本的不同。不言而喻，今天如果不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同它合作并結成同盟，无原則地追随它，那就必然会使人民的事业遭到最严重的失败，从而成为对全世界人民的最可耻的阶级背叛。即使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搬出“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也不能为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做法进行辩护。因为，第一，虽然决不应当輕視西德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但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并不是西德和法国帝国主义，而正是美帝国主义。第二，不能不加区别地把目前美帝国主义和西德、法国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与对立的情况，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帝国主义和日德意帝

國主義之間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和战争完全等量齐观。尽管今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正在加剧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但是主要的方面仍然在于它们结成了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同社会主义、民主、独立与和平相对抗的帝国主义同盟。即使季莫费耶夫把他无原则地追随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做法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罗斯福的联合，那也只不过是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完全不顾历史情况而进行无聊的机械式的类推的错误。

第二，季莫费耶夫企图使美化肯尼迪的做法合法化，这也暴露了他自己所犯的美化罗斯福的错误。

对他来说，罗斯福同肯尼迪一样，“总的来说”，虽然“都是符合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的”，但他同肯尼迪一样，也是一个“对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多多少少都有现实的考虑”的政治家。如果借用他上面歪曲地引用的列宁的话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开明人士”。他说：

“不管是罗斯福还是肯尼迪当然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们俩人都竭力捍卫美国垄断资本的立场，对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多多少少都有现实的考虑。他们二人的行动在客观上基本上有利于本国的统治阶级。罗斯福的‘新政’也罢，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也罢，总的来说，都是符合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的。”（黑体是引者用的）

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季莫费耶夫等人是怎样美化肯尼迪的。他把罗斯福和肯尼迪相提并论，实际上只是把他美化肯尼迪的说法，原封不动地使用到了罗斯福的身上。他的文章从头至尾都是缺乏任何科学论证的。而且，这不仅不能成为美化肯尼迪的论据，反而只能加倍地证明他对帝国主义者是抱有幻想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打败德意日帝国主义，民主和社

社会主义力量同罗斯福实行暂时的联合，这絕不意味着罗斯福不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或者他的政府采取了代表人民利益的进步政策。不論是以罗斯福为政治領袖的美帝国主义，还是以希特勒为領袖的德帝国主义，都具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本性；而且，这两个帝国主义資产阶级，作为正在成为寄生的和腐朽的資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差別已經“极度縮小”，而美英同德国的对立，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之間的利害冲突，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是一种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如此，比如罗斯福和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差別，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來說，在策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差別也只是限于当时那件事情上，当时罗斯福只有同日德意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才能維护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同时，罗斯福的以“自由主义方法”（列寧）为基础的“美國式”的統治方法，同以公开采用暴力統治方法为特点的日德意的軍国主义和法西斯統治的方法不同。季莫費耶夫引用的季米特洛夫和毛泽东的話，证明了这两位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正是从这种实践观点出发，看透了帝国主义資产阶级本质上的共同性，而且又正确地认清了它們在政治上的差別，并在策略上正确地运用了这种差別。作为这种識別錯誤的例子有这样一些：如季米特洛夫所指出的沒有正确地認識布呂宁政府同希特勒政府的不同；或者如众所周知的，把罗斯福的政策看作是“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表現”的“左”傾宗派主义的錯誤；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共产党總书记白劳德背叛了工人阶级，对罗斯福抱有幻想并且无原則地追随罗斯福，他犯了世人皆知的典型的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錯誤。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締結了德黑兰协定的时候，白劳德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德黑兰政策”，把那种暂时的联合夸张为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美好的“和平共处”，并且进

而在美國國內也採取了讓工人階級無原則地追隨壟斷資產階級的典型的階級合作路線。白勞德說：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開始找到了在同一个世界上和平共處和合作的道路。”（白勞德著《德黑蘭：我們在和平和戰爭中的道路》。引自福斯特著《美國共黨史》，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四五頁）

“我們要通過我國現有的政黨結構，主要是奇特的美國兩黨制這個結構，來試圖實現我們和大多數美國人共同持有的政治目標。”（同上書，第四五七頁）

大家都看到了，白勞德的話同季莫費耶夫等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無原則的“和平共處”論和支持約翰遜的行為是一模一樣的。

季莫費耶夫不僅在評價肯尼迪問題上犯了錯誤，而且還錯誤地把這種錯誤擴大到評價羅斯福的問題上，通過這一點，他親自給我們證明了他在對待美帝國主義的問題上所犯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錯誤的歷史。

他的錯誤在於，不是正確地學習季米特洛夫和毛澤東，而是相反地盲目追隨白勞德，夸大小帝國主義者之間在政治上的差別並把它加以絕對化，他看不到它們之間在本質上的共同性，從而美化了一部分帝國主義者（以羅斯福和肯尼迪為代表的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

關於白勞德，福斯特曾說過下述一段話：

“白勞德奉行德黑蘭政策，就成了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他夸耀美國壟斷資本的‘進步’作用；他在工人中間散播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他企圖使面對橫強的帝國主義的勞工運動和殖民地人民涣散瓦解，他还企圖消滅美帝國主義最大敵人的共產黨。德黑蘭政策是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而不是為工人階級利益擬訂的有效果

的綱領。它的作用是促进华尔街战后霸占全世界，并且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同上书，第四五九頁）

对于被称为白劳德的“德黑兰政策”的战后版的、赫魯曉夫的“美苏合作”政策，季莫費耶夫总是挖空心思去维护它。季莫費耶夫究竟是怎样理解美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福斯特的話呢？这个話听起来不正好是在譴責和批判現在的季莫費耶夫等人嗎？

在今天的具体条件下，正确地运用曾經正确地发展了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的道略，决不是如同季莫費耶夫等人那样追随肯尼迪和約翰逊、执行无原則的“美苏合作”政策的道路。同季莫費耶夫等人完全相反，在今天的形势下，正确地继承和发展这些国际經驗的道路，是要象过去为孤立和打倒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日德意帝国主义——实现了最广泛的反法西斯力量的統一行动那样，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要实现最广泛的反帝和平力量的統一行动。《莫斯科声明》曾就世界和平的事业明确地說过：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須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國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統一戰線。”（《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七頁）

很明显，季莫費耶夫等人絲毫不想了解战前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今天的反帝和平統一戰線中包含的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而只想去歪曲它的精神实质。

五、所謂“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誣蔑

季莫費耶夫在題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概念的危害性》的最后一

节里，对本报評論員文章中“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和“肯尼迪的‘两手政策’的实质”这两节中的論点，进行了一些反駁。他在这一节里，居然在政治上认定評論員文章和《赤旗报》編輯部的立場是“新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对我党进行的不容忽視的严重攻击。

众所周知，所謂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形态，它的主要政治理論特点是，否认在一个国家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而主张“不斷革命”論，提倡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力和干涉来“輸出”革命，否认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民主革命政权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战綫政策，不顾客观形势而企图“自上而下地激发”革命的冒动主义等等。在他們的革命的空話后面，隱藏着他們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极端不信任。我們党的理論和政策同这种立場毫不相干，这是无需重新加以論证的。不仅如此，我們党还同日本的現代托洛茨基分子的挑衅性的理論和阴谋活动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粉碎他們的革命經驗。这些現代托洛茨基分子的挑衅性的理論和阴谋活动是照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論和政策，并且把它运用于当代，他們否认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宣称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不顾日本人民所面临的爭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和提高生活水平这样一些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提倡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反对日美“安全條約”的斗争过程中，把“激发革命”这种极端“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搬到运动中来，企图扰乱人民的統一行动。通过这些斗争，我們党不仅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方面，而且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方面，都得以加强了全党理論的和实践的武装。我們党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始終如一的。

“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个把最大的目的放在顛覆社会主义国家

和破坏各国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党——共产党的、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挑衅分子集团，当然也是我国民主运动的挑衅分子和捣乱分子。他們同工人阶级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他們的‘极左’的言行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們的本质而已。因此，从民主运动中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并且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粉碎他們，这不仅是我們党的任务，而且也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任务”。（一九六〇年第七屆党代表大会十一次中央全会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在反对“安全條約”斗争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繼續前进》。）

“为了消除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党为目的的反革命挑撥集团托派分子的影响，保卫反对‘安全條約’联合斗争組織与各种群众运动免受他們的破坏，党在揭露他們的真实面目的同时，在思想、理論和組織方面也进行了精力充沛的斗争。……由于党这样地进行了斗争，所以促进了托派集團內部的崩溃，削弱了托派分子在学生、知識分子和极少一部分工人中间的影响。”（《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載《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三八——三九頁）

給这样的日本共产党扣上“新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诬蔑。

此外，在这个时候，我們不能不想起这样的事实：修正主义国际潮流，不仅支持日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而且还支持日本的托派学生潮流同这些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长期以来一直对我们党和战斗的民主青年和学生运动进行丑恶的、攻击性的阴谋活动。正因为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的和叛徒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虽然看起来他們似乎是各站在两个极端上，但是在实践上却很容易取得一致，互相利用。

而且，季莫費耶夫在千方百計地設法“論證”他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誣蔑时所使用的方法又是非常欺詐的和浅薄的。

(1) 三種歪曲

首先，季莫費耶夫把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思想归結为“越坏越好”这样一个命題，并下了一个定义，說它的主要特点是“为赤裸裸的暴力、种种激变和战争进行辩护”。他說：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分子的‘不断革命’这一欺骗性公式的‘理論’出发点之一，就在于試圖把革命工人运动高涨的前景看作取决于战争、取决于资产阶级恐怖統治手段和經濟崩溃。为赤裸裸的暴力、种种激变和战争进行辩护，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作为在列寧和斯大林领导下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过多年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并把它粉碎了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論家，給托洛茨基主义下这样的定义，未免过于浅陋了。但是，他引用評論員文章中符合这个定义的段落只有一处，即那篇文章談到的“帝国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政策和让步，比暴力政策更加危险”(《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八頁)。他作了如下的批評：

“如果按照中国领导人和《赤旗报》評論員的邏輯，那么甚至可以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极右分子当权好象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赤旗报》文章的作者用假革命的空洞詞藻来掩盖自己，跟着北京领导人滚到支持托洛茨基主义政綱的立場上去，事实上在宣传‘越坏越好’这一反列寧主义的思想”。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中间，有誰会贊同这种立場呢？共产党人从来不曾认为，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手段以及孕育着軍事冲突的政策，对劳动人民說来是‘危險更少的’。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

义胜利以前，在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顽强斗争中，越来越需要引导群众去争取新的重要的让步。共产党人反对消极地等待某一个‘未知’的日子到来，反对企图把革命运动高涨的前途只同战争和经济的激变联系起来。”（黑体是引者用的）

这样，他就把我们党的立场的特点规定为“越坏越妙的反列宁主义思想”，并从这一点出发谴责我们党反对防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他说：

“他们抵制防止世界核战争的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日益露骨地号召把争取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改变为争取给予中国以拥有核武器的权利的斗争。同这一点有联系，他们还反对在三个领域内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反对苏联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甚至达到了公然地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的地步”。

不仅如此。据季莫费耶夫说，我们党还否认争取一切改良和让步。他说：

“《赤旗报》文章的作者，对于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顽强的阶级斗争中争得的让步的评价，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贬低意大利、法国、比利时以及日本等国近年来日益发展的争取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包括国有化和国有化部门的民主管理以及扩大工会的权利等等）的群众斗争的意义，难道能说这是正确的吗？”。

季莫费耶夫的这种攻击，是把评论员文章经过三重歪曲而编造出来的。

第一，除了恶意地、有意识地要进行歪曲以外，就不会从评论员文章谈到的一般说来对让步所具有的两面性要特别指出其危险的一面这一句话中得出结论，说评论员对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政策”比对其“自由主义政策”更喜欢，说他欢迎极右派的权力，认为

“越坏越好”。評論員的文章对那句話曾立即解釋說，“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被这种让步所欺骗”（《肯尼迪与美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八頁），并明确地指出，对工人阶级來說，“自由主义”政策比“暴力政策”具有更危险的一面的意思。在評論員文章所引用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列寧还作了如下的闡述：

“当这种方法（暴力的方法——引者注）盛行于德国的时候，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或如当时所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增长……。在一八九〇年轉而采取了‘让步’政策，这种轉变照例是对工人运动更加有害的，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十六卷，第三五〇頁）（黑体是引者用的）

列寧曾經說“轉而采取了‘让步’政策”，“照例是”“更加有害的”。难道季莫費耶夫还要說列寧也有“越坏越好”的思想嗎？

統治阶级的让步經常具有列寧所指出的更大危险性，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存在的。这一点，已由肯尼迪用“两手政策”欺骗赫魯曉夫和季莫費耶夫，从而使他們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事实而得到确凿的证实。列寧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轉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同上书，第三五〇頁）。而肯尼迪的“两手政策”的轉折，则使以赫魯曉夫为首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猖狂起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面临公开分裂的危险。

第二，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我們党战斗在我国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前列，已經取得了最明显的成績。但是，季莫費耶夫却攻击

我們党的这种活动是“抵制防止世界核战争的运动”。这只不过是告訴我們，他所考慮的“防止世界核战争的运动”，是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并且它同在日本开展的主要锋芒是針對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的群众性战斗的运动，簡直是没有共同点。的确，我国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也好，我們党也好，都沒有搞季莫費耶夫等人所要搞的那种贊揚“美苏合作”、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运动。然而，这絲毫不意味着我們党“抵制防止世界核战争的运动”，反而意味着我們党最认真地为防止核战争而进行了斗争。因为象他們所考慮的那种“防止世界核战争的运动”不仅无助于防止核战争，反而只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核战争政策有利。此外，他誣蔑說我們党“号召把爭取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改变为爭取給予中国以拥有核武器的权利的斗争”，这只不过是他們再一次供认，由赫魯曉夫締結并由季莫費耶夫加以称赞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真正目的之一，就在于維持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就在于不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核包围的政策进行斗争，并且追随这一政策而不給中国核武器。

第三，誣蔑評論員文章拒絕爭取让步和改良，否认它的意义，这也是根本不值一駁的。評論員的文章，不仅明确地、有原則性地批判了那种对仿佛是让步的敌人抱有幻想或者向敌人作无原則妥協的右傾机会主义，而且也明确地、有原則性地批判了那种否定一切爭取让步和改良的斗争以及作必要妥協的左傾机会主义。这是完全无需爭辯的。讓我們从評論員文章中引出一段来看一下吧。

“不言而喻，我們承认，有可能通过以全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群众斗争为基础的‘談判’来迫使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后退，也有可能进而迫使帝国主义簽訂一定的协定，譬如，簽訂包括禁止核武器在内的普遍裁軍協定

等等；并且承认，在打倒和消灭帝国主义以前，也有可能通过这些斗争，使防止世界战争的事业获得成功。……完全排除这些可能性，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可能性的做法，意味着反而会陷入象‘左倾’幼稚病那样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九页）

季莫费耶夫提出的批判，显然完全是根据对评论员文章所作的歪曲进行的。

（2）改良主义与革命的观点

然而，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季莫费耶夫不仅进行了歪曲，而且还由于他把评论员文章和我们党的立场硬说成是“越坏越妙”，反而再一次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站在相反的方面，站在典型的改良主义立场即站在“越好越妙”这一片面的立场上。

不论是单纯的“越坏越妙”的逻辑，还是单纯的“越好越妙”的逻辑，实际上都不过是抛弃了正确的革命观点的“左”的或者右的机会主义的不同表现而已。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一九〇一年批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不了解地方自治局（一八六四年在俄国建立的地方自治机关）所具有的两面性，而“以直线连接地方自治局和宪法”时，这样写道：

“地方自治局和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乃是改良与革命的关系这个总问题中一个个别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个别情况，看到时髦的伯恩施坦派理论的整个狭隘性和荒诞不经，这种理论用争取改良的斗争来代替革命的斗争，它宣布……‘进步的原则便是愈好愈妙’。这一原则，整个说来，和它的反面——愈坏愈妙——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当然，革命者从不放弃为争取各项改革而斗争，从不放弃夺取敌人的、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和个别的阵地，只要

這一陣地能增強他們的攻擊力量和有助於取得完全的勝利。然而，他們從來也沒有忘記，有時敵人主動退出某一個陣地，正是為了分割和更容易地擊潰進攻者。他們從來沒有忘記，只有永遠記住‘最終目的’，只有從总的革命鬥爭的觀點來評價每一個‘前進’步驟和每一項個別的改革，才能夠保證在前進的路上不致失足和不犯可耻的錯誤”。（《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義的漢尼拔》，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五卷，第五十七頁）（黑體是引者用的）

很明顯，季莫費耶夫是站在這個“时髦的伯恩施坦派理論”——用列寧的另一句話說，就是“隨時隨地支持‘比較好的東西’”這一“資產階級庸俗的進步派的策略”（《再論杜馬內閣》，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十一卷，第五十七頁）——的立場上。

在季莫費耶夫看來，肯尼迪和約翰遜比戈德華特好，這一點就是好的；“自由主義”政策比暴力政策好，這一點就是好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比不限制核試驗好，這一點就是好的；一切改良比維持現狀好，這一點就是好的；只有最右翼才是敵人，其他人，不管是什麼人，都應當給予支持。從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把世界人民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一“最終目的”出發，應當怎樣評價肯尼迪和戈德華特，怎樣評價自由主義政策和暴力政策；從阻止核戰爭、禁止核武器這一個禁止原子弹氫彈運動的“最終目的”出發，應當怎樣評價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和把它擺在什麼樣的地位上，象這樣一種革命家的觀點，季莫費耶夫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

在這裡需要聲明一下，評論員的文章主要是一篇以論述關於世界人民維護和平的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正確的國際政策為主

題的文章，而不是以論述改良和革命的关系等問題為主題的文章。因此，那篇文章几乎沒有談到改良問題。季莫費耶夫說，“《赤旗報》文章的作者，宣传改良的‘危險性’，宣传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政府施加壓力是不適宜的，并且把劳动人民目前爭取實現根本改革的斗争，同‘反对壟斷資本的革命斗争’人为地分割开来”。然而，季莫費耶夫下这种断言的唯一根据，实际上只是評論員文章中的一行字，即“否认对日本壟斷資本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改良主义的‘结构改革論’”（《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五〇頁）。

对季莫費耶夫的这种近乎捏造的指責和攻击，我們真替他感到惋惜，但是，既然他提出了改良的問題，那么我們也不能不稍微談談他的改良主义的論調。

季莫費耶夫不能理解的第一个問題，是下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性的論點：对敌人的一切让步和改良，不应当无条件地都加以肯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一切改良都具有“两面性”。正如列寧在一切場合反复指出的那样，一般說來，改良具有两面性，即具有对人民的要求实行部分的让步的性质和具有作为欺骗、削弱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工具的性质。

“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正因为它は趋向改善的一个一定的步骤或‘阶段’。但是任何改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面性。改良是統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精力，模糊他們的認識，等等”（《不应当怎样写決議》，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十二卷，第二二二頁）（黑体是列寧用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改良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会由于改良出現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时，在革命运动

中会占领敌人的部分的阵地，有时会成为敌人攻击革命运动的重要手段。一切改良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在工人运动中既会产生正确地利用改良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观点，也会产生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利用改良来转移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视线的那种改良主义的观点。

然而，季莫费耶夫一面把评论员文章指出改良主义的危险偷梁换柱地说成是全面否定改良，攻击什么评论员文章全盘否定了改良，而另一方面却又只是强调当前进行改良斗争的重要性。

季莫费耶夫认定没有把革命和改良作为主要论题（正如我们刚才已经指出的那样）的评论员文章轻视改良斗争的意义而进行了批评。他的这种批评，只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毫无根据的诬蔑而已。而且，季莫费耶夫在进行这种诬蔑的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地攻击那些指出改良主义危险的话，都是什么否认改良的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空话”，而另一方面他却对改良主义的危险丝毫不加以警惕。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深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了，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了，这一切，一般说来，使人们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改良的历史条件增加，而且使这个斗争的意义也更加重大了。今天，我们正在争取缔结全面裁军协定和禁止核武器协定，争取实现人民掌握特定的垄断企业及其国有化，争取扩大社会保障——能够最可靠地保障实现这些目标的是建立人民的政权，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而即使作为改良斗争，这些也都是应当完成的民主主义的任务。尽管今天的形势要求在广泛的范围内完成上述那些改良的任务，但是同时今天的形势也进一步增加了改良主义的

危險。这种情况正在由下述事实清楚地表現出来：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領域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潮流，对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仍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不仅如此，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已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因此，今天围绕着改良所进行的爭論的焦点，并不象季莫費耶夫简单地认定的那样，是是否承认改良的意义那种肤浅的問題，而是今天改良主义地，还是根据革命的观点来进行以最大的群众規模展开的广泛的改良斗争。例如，围绕着全面裁軍和禁止核武器而进行的爭論的本质，在于两条路綫的对立，即从在“美苏合作”下締結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走向防止核扩散的一条改良主义路綫，同揭露赫魯曉夫的“美苏合作”和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欺骗性、和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爭取真正的裁軍和禁止核武器的一条路綫之間的对立。同时，围绕着季莫費耶夫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搬出来的“结构改革”問題所展开的爭論的本质也在于两条路綫的对立，即在垄断資本的政权下，依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地干預”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通过不断的改良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样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綫，同把“民主改革”的位置正确地摆在推翻垄断資本的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的革命斗争中的这样一条路綫之間的对立。

季莫費耶夫不能理解的第二个問題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間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列宁：《再論杜馬內閣》，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十一卷，第五十七頁）。

真正能够促进革命斗争的那种改良，如果仅仅依靠爭取改良的斗争，是絕對不能爭取到的。例如，全面裁軍协定、禁止使用核武器协定、全面禁止核武器协定，只有在保卫和平运动和禁止核武

器运动那样的独立民主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发展、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推翻垄断资本的统治的革命斗争的巨大发展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争取得到。人民掌握垄断企业和国有化，虽然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要求，但对垄断集团是一个严重打击。既然如此，那么它就是在争取推翻垄断资本主义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巨大发展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实现的改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为了排除垄断资本主义政权的顽强的抵抗，由人民来确实地真正地实行上述要求，就必须建立人民的政权。关于这一点，列宁指出的下述真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事实上，凡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凡是作为战果而保持住的，夺得多少和保持住多少，完全要看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进行工作的一切场所如何有力和活跃而定。……谁也不能预言，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真正民主的改革可以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决定改革的程度和成就”（《“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十七卷，第一〇九页）。（黑体是引者用的）

因此，实际上，无产阶级和人民越是从改良主义的思想——象季莫费耶夫等人所陷入的那样，把改良的积累本身当作自己的目的，看不见它同取得政权即革命之间的联系——解放出来，加强他们的团结和斗争，就越能争取到各种改良，并且能够巩固和利用这个成果。如果按照季莫费耶夫那样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那么，别说什么革命，就是连多少有点意义的改良也几乎完全争取不到。

实际上，是季莫费耶夫自己的伯恩施坦派的观点使他把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看成是“新托洛茨基主义”。很明显，季莫费耶夫等人诬蔑我们党是什么“新托洛茨基主义”，这只不过是

企图掩饰他的那种丧失了革命观点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已。

(3) 現在还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

季莫費耶夫攻击說評論員文章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的論据是，他硬說評論員文章对“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的批判，同所謂“帝国主义的美国主义”和“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这样的“托洛茨基的一些可耻的‘理論’公式令人惊奇地吻合”。于是他作了如下的反駁：

“为了轉移視線，文章作者杜撰了一种‘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似乎說他們的論敵在宣传这种理論。他們指責那些据说正在宣传实际并不存在的理論的人們，說他們‘为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辯解’。……《赤旗报》杜撰、捏造了这种理論，而現在却竭尽全力来攻击自己的发明。

“这一切做法是为了什么呢？显然是为了更便于宣传同《宣言》和《声明》背道而馳的錯誤概念。这种概念的实质是用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宣言偷換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对同时也反对西德、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的提法本身保持缄默，甚至极力对抗”。（黑体是引者用的）

季莫費耶夫利用評論員写文章时避免指名攻击其他党的这一情况，声称“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是“实际并不存在的理論”。我們能够举出的实际例子多得很，但是在这里，只提出有关苏共領導的一些证据。

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自从公然开始同肯尼迪实行无原則的“美苏合作”以来，一面尽量避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全面的公开的批评，为代表美帝国主义的肯尼迪政府及其政策开脫罪責，一面又象評論員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的极右派以及复仇主义

的西德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法国帝国主义的过激分子”中間寻找“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勢力”。

苏联政府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說：“在三国代表莫斯科会談結束后的几天之中，那些不喜欢和平力量的新的重大成就的人就已經明显地暴露出来。那首先是**美國的所謂‘狂人’**……。那是至今仍然策划着新軍事冒险計劃的**西德軍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营垒中的最极端分子。那是**法國統治集團阵营的过激分子**。”(黑体是引者用的)

而且，他們还說什么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危险，与其說是由于美帝国主义本身的侵略性，不如說首先是由于它企图用核武器来武装西德帝国主义。

苏联政府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說：“我們过去和現在都在批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为西德核武装打开門戶，至少是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国家共同获得核武装。”

不仅如此，如果让赫魯曉夫等人說究竟是哪一方而坏，那他就会认为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才是企图使美国同苏联发生冲突的罪魁禍首，并且把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表們描绘得同苏联一样，都是西德帝国主义的复仇主义的受害者。这甚至已經不是說哪一方面坏的問題，而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地替美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論調。

赫魯曉夫說：“現在，西德最富侵略性的复仇主义勢力想使我們苏联和美国在德国問題上、在和約問題上发生冲突。他們并不想要这种和平，因为他们仍然梦想能依靠美国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国界。当然他們懂得，不打仗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完全有意識地在把事情引向冲突。

我相信，这一目的和这些利益是同美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如果确定美国政策的国务活动家意識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把他們推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并且在这个問題上站在符合本国利益的立場，那么我們有可能迅速达成協議和簽訂和約。”（赫魯曉夫同《展望》杂志編輯兼发行人的談話，載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領導的这种理論，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別是給欧洲的共产党带来了不可忽視的影响。例如，在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后，有的同志說，“各种国家的冷戰支持者”有“美国的‘狂人’、西德的复仇主义者、反动的戴高乐一伙”，而对于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充当头目的美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却只字不提，而只是強調說欧洲最大的危险是“波恩—巴黎軸心”。这种看法在国际會議上提出来，甚至时常出現在正式的文件中。

上面引用的那些話都不容置辯地证明“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決不是評論員杜撰、捏造出来的論調，而是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領導有系統地提出的主张，而且評論員文章指出的四个特点，絲毫也沒有夸大的成分，是非常正确的。

評論員文章提出的主张，決不是象季莫費耶夫再次歪曲和誣蔑的那样，“同托洛茨基的一些可耻的‘理論’公式令人惊奇地吻合”，“只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对同时也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的提法本身保持缄默。我們在这里不能不再次引用《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

这篇文章說：“当然，过低估計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危险是不正确的；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对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動向保持更大警惕的必要性增加了。但是，以复活了的西

德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为理由，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开脱，轻视或者不理会对它的斗争的重要性，这只是意味着完全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人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参阅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十八页）

季莫费耶夫说《赤旗报》编辑部否认今天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美国起着不利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异曲同工的反驳。

因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所否定的只是那种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已经代替美帝国主义而成为主要危险的、“整个说来是把事情片面化的错误理论”（同上书，第二〇页）。《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全面地分析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而使美国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给今天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带来的后果，同时作了如下的结论：

“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美国和法国、西德和英国、英国和法国、还有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正在越来越趋于尖锐，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动摇，美帝国主义也日益陷于孤立。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平运动这样一些世界历史性对立的另一方面相对抗，而加紧进行侵略、民族压迫、政治上的反动活动，为了维持它们的统治体系等等目的，它们之间的利害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需要继续维持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同盟。因此，尽管不平衡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但是在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关系上，主要的方面并没有变成对立和分裂；同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控制地位这件事相联系，依附性的联盟关系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关系这个局面并没有改变。”（参阅同上书，第二十一——二十二页）

如果是反对这样的分析，那么，季莫費耶夫不應該进行不攻自破的誣蔑，說什么評論員否定美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对下降，而应当根据事实反駁評論員的这样一个論点：尽管美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对地下降了，但是它仍然保持着統治地位。大家知道，《莫斯科声明》认为帝国主义者“結成以美国为首的各种軍事政治聯盟”，并且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的統治地位，說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勢力的主要堡垒”。

《声明》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腐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許多国家中执政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级，再也无力单独对付日益增长和團結起来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帝国主义者結成以美国为首的各种軍事政治聯盟，共同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陣營的斗争，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許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勢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十一頁）

而且在这里不容忽視的是，季莫費耶夫把事情描繪成这样，仿佛評論員文章的观点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中間地帶論”为基础的，这个“北京强加于人的錯誤方針”使我們党低估了反对日本垄断資本的斗争的重要性，从而对四·一七罢工采取了錯誤的态度。

在四·一七罢工时，我們党中央委員会政治局由于集体領導的一时削弱而在具体情况下犯了錯誤，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脫离了我們党的綱領的观点和我們党中央委員会的基本路綫，把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国际統一戰綫的主要敌人这一思想机械地搬到日本国内的斗争中来，結果产生了輕視日本垄断資本的、片面的教条主义的观点，这是事实。但是，这种錯誤 是我們党自己負責的問題，而在季莫費耶夫的批評文章中却把这說成似乎与中国共

产党的“强加于人”有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我們党进行的双重的无理攻击。众所周知，我們党領導很早就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且克服了这个錯誤。季莫費耶夫試圖抓住这一点来证明我們党的理論和路綫是錯誤的，为修正主义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謬論进行辩护，这是决不会得逞的。因为在四·一七罢工时我們党所犯的暂时性的錯誤和糾正这个錯誤的整个过程，再一次深刻地证明，我們党的綱領提出的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这“两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而我們党中央委員会采取的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条战綫上进行不妥协的思想上、理論上的斗争这一基本路綫，也是一貫正确的。正如我們党的第九次中央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委員会政治局的公开文件《关于春季斗争与四·一七罢工問題的总结和工人运动当前的問題》所說的那样，圍繞着四·一七罢工，政治局在领导工作上所犯的錯誤并不是在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委員会上作出的各项決議所規定的路綫的錯誤，相反地，正是一時削弱了根据这条路綫进行的领导工作的期間發生的錯誤，是由于“暫時地、部分地”“背离”“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科学原則和党的綱領、代表大会以及中央委員会作出的各项決議所規定的正确路綫”而犯的錯誤。

《莫斯科声明》規定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声明》又說：

“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非歐洲的某些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針對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針對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資本和其他反动势力。”（《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二頁）

我們党和評論員文章的立場就是，在国际上反对以美帝国主

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国内为反对控制日本的美帝国主义和处于依附地位而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而斗争。这正是最忠实地遵守《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的立场。

季莫费耶夫攻击我们党的这一立场是“新托洛茨基主义”，这就等于攻击《莫斯科声明》本身是“新托洛茨基主义”。季莫费耶夫拿所谓“新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大帽子来攻击我们党，只能有助于非常明显地证实他是站在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背离《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路线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立场上。

六、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 的“乐观主义”

季莫费耶夫在文章的结尾说，“《赤旗报》的立场是贯穿着悲观主义的。”他在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以后说：

“实际上文章作者不相信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能抑制帝国主义，能阻止它发动新的世界战争。**过高估計帝国主义的可能性，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据说它使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一切“服从”于它），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工人阶级和日本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計不足**，这就是《赤旗报》编辑部现在采取的立场的真正实质。……这种不正确的立场是同《宣言》和《声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纲领文件中所贯穿的有科学根据的革命乐观主义相违背的。”（黑体是季莫费耶夫用的）

然而，成问题的是，把我们指责为“悲观主义”的季莫费耶夫的“乐观主义”，是以同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毫无关系的、缺乏阶级观

点和科学观点的立場为前提的。

第一，十分明显的事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要拥护的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正如他們在給我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中所清楚地自我暴露出来的那样，說什么帝国主义者失掉了施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还說什么帝国主义者“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等等，这些說法，不論在理論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种致命的錯觉。

难道說，在“东京湾”进行攻击和繼續对南越进行殘暴的侵略战争不是推行“‘实力地位’政策”嗎？如果不得不把这些事实看作是“‘实力地位’政策”，那么，难道能够认为这是在丧失了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推行的“‘实力地位’政策”嗎？其次，如果认为帝国主义者已經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那么，怎样去解釋美帝国主义者一貫玩弄一切卑鄙的花招，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的情况呢？另外，难道要把无耻地侵略南越、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等等繼續鎮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明目张胆地蹂躏这些国家的主权的情况，看作是同美帝国主义“‘实力地位’政策”沒有关系的什么别的現象嗎？

在赫魯曉夫和季莫費耶夫的头脑中，事实上认为（他們的实际感受也如此）“美苏合作”才是判断国际形势方面的最大准则。因此，他們才对肯尼迪和約翰逊的“两手政策”产生了根本的錯觉并作出了錯誤的估計；由于他們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些代表所产生的錯觉，而使得对美帝国主义本身的美化和抱有的幻想在他們的头脑中占居了統治地位。

因此，他們所謂的“乐观”，是用美丽的幻想描繪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沒有科学根据的“乐观”。从那里只能产生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只能作出追随美帝国主义的、苟且偷安的机

会主义的估計。

第二个很明顯的事实是，季莫費耶夫在這裡把“能抑制”帝国主义者、“能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力量看作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

我們党中央委員會在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信件（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中表示，我們党中央委員會將全面地駁斥那种說我們輕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的批評，同时还指出：“你們把現时代的主要矛盾簡單地只归結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的斗争的那种观点，才是不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各个論点的、并且輕視資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与殖民地、附属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的錯誤观点”。“我們作了如下的評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为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是‘决定現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內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所有这些力量一面給帝国主义以新的打击，一面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決定性因素，并确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即最后帝国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日共中央給苏共中央的复信》，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十五頁）

季莫費耶夫不是把“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內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是把它縮小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实际上正如本文对赫魯曉夫的“三重縮小”所已經指出的那样，把它縮小到以苏联一国为中心，并根据这一点，大肆指責我們“对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工人阶级和日本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計不足”。的确，我們沒有象赫魯曉夫和季莫費耶夫那样，认为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力量只是社会主义力量——事实上只

是苏联一国。我們虽然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意义和使命要恰当地給予評价，但是，在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勢力进行斗争的力量問題上，同《莫斯科声明》一样，我們采取下述这种整体的观点。

“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十七頁）

季莫費耶夫强加給我們党評論員的“悲观主义”这种指责，显然只有在对上述推动现代世界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做出不正确的評价和明显地背离《莫斯科声明》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說穿了，季莫費耶夫的想法是这样的：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穷追猛打的結果，美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加剧了，并且分裂成为好战的极右派和“开明的”“和平共处”派。我們的任务在于扩大这一裂痕，为此要同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派携起手来，只把极右派作为敌人加以孤立，并且“抑制”和“阻止”帝国主义，促使他們朝着“和平共处”和“裁軍”的方向前进。現在，世界社会主义是拥有这样的力量的。他还认为，不贊成他的这一套，而主张把整个美帝国主义者作为敌人进行斗争这件事，結果就意味着不是“乐观”地相信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是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强大采取了“悲观”的态度。

但是，我們同季莫費耶夫的意見分歧，并不在于是否“乐观”地相信帝国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这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正如季莫費耶夫在另一种意义上所承认的那样，分歧是来自对包括“现代世界发展的根本問題”在内的当代重大問題采取的不同态度。这种分歧基本上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是采取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观点，还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的战争、侵略和反动勢力

的罪魁，而采取一贯同它斗争的观点；与此相关的，是美化肯尼迪和约翰逊，还是认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用阶级的观点来认识他们的“两手政策”；另外，是从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种革命观点出发，正确地估计和利用帝国主义者内部的矛盾和对立，还是以利用内部矛盾为借口，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代表。

其次，根本性的分歧在于：是把抑制帝国主义、阻止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力量，只看作是社会主义力量——实际上只以苏联一国为中心呢，还是不局限于此，认为是真正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一切力量、反对战争的一切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合？

季莫费耶夫的观点就是这样在今天社会历史发展的斗争问题上，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在划分敌我性质与范围的问题上，坚持了根本错误的观点——修正主义的观点和大国主义的观点。既然如此，他们当然要把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估计看作是应当扣上“新托洛茨基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帽子并加以排斥的东西了。而实际上，以赫鲁晓夫和季莫费耶夫为代表的这些观点的根深蒂固的错误本质，恰恰是问题的所在。

在目前形势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真正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正如我们反复阐述的那样，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两手政策”的本质是美帝国主义在力量对比处于无可挽回的劣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欺骗性的反击政策。同时，这个“两手政策”也是利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制造的不团结，用美苏“缓和紧张局势”来吸引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集中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认为应该在坚定

地相信世界人民坚决反对敌人的力量的基础上，揭露他們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同与之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变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全面加强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以便把帝国主义者赶到走投无路的境地。而且，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只有在世界人民的这种反帝斗争的革命前进当中，才能获得它的副产品，比如迫使敌人在签订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全面裁军协定等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这条基本路线才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莫斯科宣言》与《莫斯科声明》所阐明的根本立场，唯有坚持这一种根本立场，确信必胜，才是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

然而，季莫费耶夫等人却以那种对正在把帝国主义赶到走投无路的力量对比的情况抱有“信心”为理由，断定肯尼迪的政策不是“两手政策”，而是“进步的”政策、“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主张只有不与之斗争，作出无原则的妥协，才能争取签订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全面裁军协定以及其他协定。正象我們已經阐明的那样，这不但不能签订表明敌人作出实质性让步的协定，反而会給敌人的反击以喘息时间，甚至蘊藏着严重危险，这势必会导致敌人进行拼命的反击，并使力量对比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认为对于导向这种处境和后果的力量对比抱有所謂“信心”和“乐观”才是真正的“好事”；毫无疑问，这不是别的，而是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把自己的头藏进自己翅膀下而心安理得的鸵鳥式的“乐观”。这样的“乐观主义”，才正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的別名，它同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他的“革命乐观主义”既然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那么，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就必然通向投降主义，立刻轉化为机会主义的“悲观主义”。例如，主张无原则的“美苏合作”的赫魯曉夫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在“古巴危机”时立刻轉化为譖于肯尼迪的核战争訛詐的机会主义的“悲观主义”，并且墮落成为悲慘的投

降主义。一个所謂美苏和好并已經快达到沒有武器、沒有战争的烏托邦的世界，突然一变，又被描绘成为面临人类毁灭危机的地獄了。正如冒险主义同投降主义互相轉化那样，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悲观主义”也是互相轉化的。“古巴危机”时的赫魯曉夫，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已經很清楚，季莫費耶夫的所謂“以科学为基础的革命乐观主义”实质上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乐观主义”，同时也只不过是表面上似乎与此对立的机会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別名而已。

其次，季莫費耶夫极尽咒罵之能事，攻击我們党，說什么“不把事情引向統一而引向分裂的方向”，什么“他們的‘反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宣言式的），在实践上，越来越变成公开的积极的反苏主义，变成瓦解和削弱群众民主运动的破坏活动”。然而实际上正是以赫魯曉夫为首的国际現代修正主义潮流及其在日本的追随者配合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和分裂阴谋，企图用美化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論調以及追随、投降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来扰乱并分裂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的最广泛的統一战綫。去年第十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及围绕这次大会发生的各种事实，极其明显地暴露了赫魯曉夫的追随者們拿着什么样的分裂主义計劃，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和我党的叛徒結合起来，竭力扩大和加深我国和平运动的混乱和分裂。不仅如此，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公开对我們党进行攻击，公开支持志賀、神山等反党分子等等，明目张胆地对我們党进行了颠覆活动。还有，正如《普罗霍洛夫等人对我們党进行的一連串的新攻击》（《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評論員文章）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后，苏共新领导仍然不

理睬我們党作为改善日苏两党关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而提出的要求，即停止對我們党进行无理的扰乱和破坏活动，反而繼續對我們党进行了种种攻击。这一切事实明确表明了，只有他們才是“不把事情引向統一而引向分裂的方向”。

季莫費耶夫还用我們党評論員的《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所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理論，进行了不外是重复其拙劣手法的反駁，从而又起到了一种制造混乱和策划分裂的作用。而且，季莫費耶夫的分裂主义是同他的“不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机会主义立場的本质有联系的，是这种立場的必然产物。

季莫費耶夫在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問題不在于反对或不反对美帝国主义”。文章的末尾又写道，“国际事件的发展，包括最近帝国主义对东南亚、塞浦路斯、古巴、刚果的侵略行动，要求共产党人在反帝斗争的各种問題上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要求加强一切进步力量和反帝力量的團結”。

假如季莫費耶夫对于这些話，以及对于他自己所說的那句“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話，是忠实信守的，那么，他就應該停止玩弄各种詭辯，不把美国政府事实上当作似乎存在于美帝国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勢力来对待；不再采取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詞句的掩护下，回避同肯尼迪和約翰逊的侵略的、反动的政策进行斗争的做法，而根据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路綫，同全世界人民一道认真地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勢力进行斗争；并且應該放弃一切使全世界人民的統一的反帝斗争陷于混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陷于分裂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論。难道这不是季莫費耶夫作为共产党人的庄严的义务嗎？

約翰遜總理一九六五年初發表的国情咨文表明，美帝国主義依然企圖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團結，採取欺騙性的“美蘇合作”政策，同時推行以“遏制中國”的政策和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為中心的凶惡的侵略亞洲的政策。然而國際現代修正主義潮流雖然在零星地、部分地修補一下使他們陷于不利處境的赫魯曉夫的極端嚴重的錯誤，但卻仍舊企圖繼續推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這種局面表明，儘管赫魯曉夫下台了，但是，反對國際現代修正主義潮流的鬥爭仍然是長期的；我們黨的評論員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所批判的美化美帝國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我們今后也要為爭取實現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統一行動而鬥爭。同時，在這個鬥爭中，要繼續徹底批判一切修正主義理論，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及《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而鬥爭。不進行這種鬥爭，就不可能战胜現代修正主義而達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真正團結。我們衷心地希望，我們同季莫費耶夫所代表的立場進行的這場爭論，能夠對恢復這種團結作出哪怕是很小的貢獻。

我們希望季莫費耶夫和《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為了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也要始終進行同志式的、正大光明的爭論。為此，我們希望《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在《共產黨人》雜誌上全文登載《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以及這篇反批判的文章。我們相信，這同時也是《共產黨人》雜誌的讀者所希望和期待的。

我們黨為了答復蘇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致日共中央的信件，在（向蘇共中央）寄送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復信時，在《赤旗報》和《前衛》上發表了來往信件的全文。這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單方面地公布了四月十八日的信

件，故而为了使全体党员和支持党的人能够正确理解我們党中央委員會的复信內容和正确了解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真实經過而發表的。我們党希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也能够采取同样的措施，于是在回信中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你們在七月十一日的来信中就公布这两封信的理由說：‘在日本共产党領導……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答复我們的信件的目前情況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不能再使党对已經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决定公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給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信和这一封信。’如果你們的目的是要把两党关系的真实情况告訴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那么，我們希望你們拿出勇气来，也公布我們党的这封对你們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我們确信，这样做对于根据事实来探求真理，是会大有帮助的。”（《日共中央給苏共中央的复信》，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五頁）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已經过了五个月的今天，在苏联党内还没有公布我們党的复信。我們不得不指出，这样就不能指望进行正大光明的同志式的討論了。

我們党針對季莫費耶夫的文章发表了这篇反批判的文章，同时也决定在《赤旗报》和《前卫》上发表季莫費耶夫对本报評論員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反駁文章。《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沒有发表《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只发表了季莫費耶夫的文章。不管《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这次是否发表我們党的这篇文章，我們仍然采取了上述措施。这是为了向全体党员和支持党的人提供方便，使他們能够客观地研究这次爭論的全貌。这种作法是为了探求真理而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措施，我們当然希望季莫費耶夫和《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也承认这一点。

（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